

# 风波后的反思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  
《风波后的反思》编写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9076

# 风波后的反思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

《风波后的反思》编写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8月

# 风 波 后 的 反 思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

《风波后的反思》编写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81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0300册

ISBN 7—5633—0540—8/G·473

定价: 1.00元

## 目 录

|      |                                 |         |
|------|---------------------------------|---------|
| 第一讲  | 共和国在危急中·····                    | ( 1 )   |
| 第二讲  | 野心家们的矛头所向·····                  | ( 10 )  |
| 第三讲  | 动乱、反革命暴乱的社会基础·····              | ( 17 )  |
| 第四讲  | 警惕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br>阴谋·····      | ( 27 )  |
| 第五讲  | 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教训<br>·····         | ( 37 )  |
| 第六讲  | 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                  | ( 45 )  |
| 第七讲  | 纯洁党的领导核心的必要措施·····              | ( 55 )  |
| 第八讲  | 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 ( 63 )  |
| 第九讲  | 继续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               | ( 73 )  |
| 第十讲  | 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 ( 82 )  |
| 第十一讲 | 青年学生在这场风波后的反思<br>·····          | ( 91 )  |
| 附录   | 广西高校在1989年春夏之交风波中的<br>基本情况····· | ( 101 ) |

# 第一讲 共和国在危急中

## ——从学潮、动乱到反革命暴乱

我国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显著，举世公认，这十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然而，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件前人从未干过的事业，这十年中，毋庸讳言，我们党有过失误，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失误，特别是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同志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松了对全民、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虚而入，在相当多的青年学生中泛滥。当1989年春夏之交，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一场血与火的考验的时候，他们迷失了方向，被一些幕后策划者组织者利用，其中少数人充当了这场动乱的急先锋。

### 一、学潮——风波骤起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1989年4月在北京开始的学潮，是早有预兆的。1988年底开始，在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阴谋分子的策划和操纵下，在首都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严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活动。

《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在一次集会上发言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

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1989年1月28日，方励之在一次有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参加的集会上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

2月初，方励之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成员陈军等人又举行所谓“名人名家联谊会”，发表煽动性演讲。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的研究员张显扬，在“文革”中犯有“三种人”错误而被清除出党，是个搞动乱的老手。这次他自以为时机又到，跳出来对“高自联”的头头们讲：“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现行的政治体制必须废除，中国人还要经历几次教训，诸如社会动乱等。”很明显，张显扬等人为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明白无误地提出需要通过“动乱”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中国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头面人物的频繁活动，博得了海外某些别有用心势力的喝采。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美国之音”等国际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的喉舌也大肆造谣惑众，煽风点火。正是在这种国内外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浊浪猛拍着高等院校的大门。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基本原则”。

3月2日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相继出现署名为“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学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法制’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一些所谓的“沙龙”也纷纷出现。仅北京大学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这个“沙龙”由王丹主持，方励之、李淑娴充当军师，为创造日后的动乱制造舆论，网罗人马，进行着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这些“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头面人物沆瀣一气，伺机发难。今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去世，他们自以为时机已到，便加紧煽动、策划，终于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首先在首都北京爆发。

北京骤起的学潮，在四月份就开始向全国许多地方蔓延，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长沙、广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受到了波及。我区虽远在边陲，同样受到北京学潮的波及。在此期间，广西也有极少数人成立非法组织，进行非法串连，张贴大小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反动口号，制造和散布各种谣言，挑动和威逼学生上街游行、静坐、示威、罢课、罢考、空校，破坏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秩序，并企图把校内的动乱引向社会，在广西制造动乱（详情见本书《附录》）。

## 二、从学潮到动乱的演变

应该肯定，绝大部分参加学潮的青年学生都抱有一股爱国热情，他们要求惩治“官倒”，反对腐败，加速社会主义改革进程的愿望是好的。实际上，党和政府一直对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予充分的肯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讲话，以及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陈云、彭真、万里等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都反复地、明确地指出，广大青年学生在推进民主、消除腐败、惩治“官倒”、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提出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对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极少数人利用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善良愿望，利用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利用党和政府的某些失误，以及前进中遇到的困难，使学潮逐步演变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动乱。

1. 这场动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对立。动乱的策划者在这个期间提出的带纲领性的政治口号，主要反映在非法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及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里面。这些条款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我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的自由。同这种口号相配合，一些所谓知识界的“精英”，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少数人，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心也是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2. 这场动乱采用的形式是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

制的。一些青年学生高喊“捍卫宪法尊严”，却又无视宪法规定，搞“四大”，张贴大小字报，制造传播谣言；他们每次游行示威都违反了所在地区关于游行示威的地方法规；他们要求民主、平等的对话，却要由他们指定政府必须派什么人来参加，必须回答什么问题，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政府；他们宣称自己搞的是民主运动，要通过民主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却又采用了绝食请愿这种超出民主和法制程序的敌对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成立了许多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3. 这场动乱采用了大量制造蛊惑人心的谣言的手法。学潮初起，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发作，抢救缓解后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一位北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电车撞伤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人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造谣说：“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

府的对立情绪，从而造成后来的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4. 这场动乱并不局限于首都高校，而是迅速向社会扩散。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提出“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广西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来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5.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香港《解放》杂志曾刊登长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阴灭”的关系。动乱期间，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给参加学潮的学生出谋划策。台湾当局的喉舌《中央日报》等报纸在这期间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许多所谓“大陆新闻”，用谎言覆盖了版面。例如6月5日台湾报纸分别以“血在流，肉在飞，万人殉难天安门”、“北京腥风血雨伤亡超过两万人”、“天安门前碧血成河”等醒目通栏标题编造了耸人听闻的谣言。台湾特务机构在此期间指示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并临时派遣特务来大陆加紧活动，插手动乱。6月11日，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会主任萧乐昌直言不讳地说：“大陆地区的民运，就是因应我们对大陆工作的绩效最好证明。”动乱期间，国民党中央宣布要募捐1亿美

元来“支援大陆民运”。一些动乱的策划者从美国、台湾、香港某些反动势力那里领取了大批的资金和物资后，准备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开办“民主大学”，声称这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反革命暴乱平息后，许多外逃的“高自联”头头都随身携带有几万元到十几万元的巨款。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学潮已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而演变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动乱。《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 三、北京：从动乱到暴乱

由于动乱导致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为了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宪法规定，国务院断然决定于5月20日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

但是，由于中央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时遇到了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作路障，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尽管遇到这些困难，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

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发生在6月3日凌晨。当戒严部队按既定计划继续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大呼大叫，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等路上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

与此同时，一伙暴徒开始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

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受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也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少数人，向天安门广场不明真相的群众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在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

6月3日晚，暴徒们开始焚烧军车和各种车辆，一些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6月4日凌晨之后，烧、打、杀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战士，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涌而上，砸开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拉上过街天桥，从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军车上。还有一名解放军战士被挖眼珠，割掉生殖器，将尸体扔进护城河。

暴乱当中，据不完全统计，被暴徒砸毁、烧毁的军车和各种车辆共1280多辆，戒严部队、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共和国，保卫宪法，保卫

人民，献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当6月9日凌晨戒严部队在恢复了本来面目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的时候，当全国人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精神饱满地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时候，人们紧悬了一个多月的心，才开始平静下来，才真正地意识到，我们共和国又经历了一次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搏斗。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人民共和国得到了捍卫，人民利益得到了保护，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青年学生开始了冷静的思索。

## 第二讲 野心家们的矛头所向

### ——动乱、反革命暴乱的实质

当学潮还在酝酿形成之初，党和政府就反复、郑重地告诫青年学生，在学潮后面隐藏着极少数居心叵测的人，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遗憾的是，一些人没有听进党和政府的多次忠告，不相信这会是事实。直到由学潮发展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极大损失；直到青年学生那双自以为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双手，打开的却是盛满罪恶和灾难的“潘多拉盒”，在客观上为社会渣滓施行暴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一部分学生才幡然醒悟，痛悔万分，深感自己的爱国热情被坏人利用了。

现在，有许多青年学生在沉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认真思考，不难发现，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生们被一种幼稚的政治激情所左右，涉世不深，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缺乏经验和洞察力。二是极少数阴谋制造动乱的人，施用狡猾伎俩，巧妙地藏起他们的“狐狸尾巴”，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把青年学生诱骗上了他们的“罪恶列车”。

剖析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反动伎俩，揭穿他们真实的反革命面目，这对广大青年学生吸取经验教训是很有益处的。

## 一、野心家们的狡猾策略

在这场风暴中，策划者和组织者们主要采用了如下的策略：

1. 把广大学生推到动乱的第一线。由于近几年来，一些青年学生没有认真地、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缺乏应有的鉴别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了解共和国的建立经历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他们没有经历过十年“文革”动乱之苦，不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容易凭感情用事，难免要陷入片面和偏颇，从而给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们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5月12日，所谓“学运低潮”时期，包遵信跑到北大的“民主沙龙”大放厥词，说什么“4·27这个日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将会大书特书”，“它的规模和深远影响都超过了五四”，明确提出“4·26社论应该推翻”。他还煽动说，一听到学生上天安门游行，“当时就特别兴奋起来”。为了给学生打气，他还胡说：“4·27”在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说“4·27”的意义在于“标志长期以来封建家长制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应该结束了”。当时不少青年学生对动乱开始失去兴趣，感到迷惑、疲惫，包遵信的这一派胡言对动乱的升级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天下午，王丹等3人在北大贴出“绝食声明”。次日，北京几百名学生开始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使动乱更加严重。

2. 掩盖起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目标。就大多数参加学潮的青年学生来说，其本心并不是要制造动乱的，他们的初衷也是希望中国加快改革和开放的步伐，使国家和民族尽快富强。然而他们始终执拗于自己的许多过激言行。少数野心家

们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和缺点，煽起青年学生的不满情绪。他们躲在幕后策划、指挥，使多数学生置身于阴谋活动之中而不识极少数坏人的险恶用心。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经过痛苦的思考，揭露了动乱的策划者李淑娴等人对动乱早有安排的真相。据这位同学揭露，李淑娴等人为动乱安排了四步：“第一步，悼念胡耀邦，顺便提出政治要求。要把为胡平反放在第一条，这样他们就不好说什么了。第二条也别提为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受挫、受批判的知识分子平反，那样太脱离群众，也容易引起误会。再有，别直接提反四项基本原则，群众最恨腐败，就用这一点攻他们。第二步则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情心。第三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了。第四步，‘五四’达到最高潮，同时要搞臭团委、学生会，使得他们没帮手”。这位学生的揭露戳到了李淑娴的痛处，她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竟当着来访同学的面破口大骂：“他妈的！”

3. 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改换口号。在一个多月的动乱中，野心家们在动乱的每个阶段，采取的每个行动，喊出的每个口号，提出的每个要求，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动乱一开始，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发表，旗帜鲜明地给这次动乱定了性，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4月26日，非法组织“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

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口号。“五四”以后，当他们看到党和政府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以为政府软弱可欺，又把这些“拥护”口号、标语收了起来，全面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标语再次出笼。

4. 在革命队伍内部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动乱开始，在极少数人策划下，采取乱箭齐发向党进攻的手法，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5月19日李鹏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他们先是提出既打倒邓小平又打倒李鹏，后又调整策略，提出“不要喊过激口号，特别是对邓小平”，“把邓小平争取过来，对下一步斗争有利”，要集中火力“打倒李鹏和伪政府”，“打倒杨尚昆”。戒严之后，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刘宾雁不顾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纷纷表态支持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定，借“美国之音”向全世界广为散布谣言说：“现在有100多个将领联名反对这种错误决定（即戒严），有很多省份和一些军师都明确表示，他们不承认李鹏政权，甚至称其为伪政权。”

## 二、野心家们的真实面目

当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真相逐步昭示天下、极少数躲在背后的“神秘人物”被逐步揭露出来的时候，人们终于恍然大悟，动乱的组织者们提出的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败”、“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等等，统统是瞒天过海的